



沈红亮 著

瓦解与重构

镇江近代前期社会转型研究（1840—1911）



南京大学出版社

| 镇江城市文化研究丛书 |

瓦解与重构

镇江近代前期社会转型研究（1840—1911）

沈红亮 著



南京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瓦解与重构：镇江近代前期社会转型研究：1840～
1911 / 沈红亮著. —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3
(镇江城市文化研究丛书)
ISBN 978-7-305-16157-5

I. ①瓦… II. ①沈… III. ①社会转型—研究—镇江
市—1840～1949 IV. ①K295.3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71587 号

出版发行 南京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 邮 编 210093
出 版 人 金鑫荣
丛 书 名 镇江城市文化研究丛书
书 名 瓦解与重构：镇江近代前期社会转型研究(1840—1911)
作 者 沈红亮
责任编辑 肖自强 编辑热线 025-83685720
照 排 南京南琳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数码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8×1000 1/16 印张 25.25 字数 412 千
版 次 2016 年 3 月第 1 版 201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5-16157-5
定 价 68.00 元

网址：<http://www.njupco.com>
官方微博：<http://weibo.com/njupco>
官方微信号：njupress
销售咨询热线：(025) 83594756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所购
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序

这本书是我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经整理充实后出版的。需要读者谅解的是，书中的很多地方尚有论文的痕迹。它凝结着我几年的心血。既是学术论文，我当然希望它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希望在学术界获得一些回应。但我却更热切的期望，在镇江的居民中赢得一批读者。因为我祈愿，这个城市的居民中有更多的人像我一样，更爱这座城市。我本人也是在研究这座城市的时候，对她有了越来越深的感情。然而，我的心里很清楚，作为一篇学术论文，在非学术领域中，只会有很少的一部分人，对这个枯燥的课题感兴趣。尽管如此，我还是以挑剔的眼光投向我的读者。

这本书研究的是晚清七十年镇江历史，力图再现这一段历史时期镇江社会的不同场景，并对社会发展趋势、历史成因和各色人物的利害选择进行分析。作为镇江人，我们可能会对自己城市史上人和事更为敏感。我们更关注这座城市的故事，也容易因此在城市历史的认知中发生错位。我们要想认识真实的历史，就必须尽量地把自己的个人情感过滤掉。就像勒庞说的那样：“必须像博物学家看着蜘蛛在慢慢地享用一只苍蝇一般。”所以，我们可以约法三章，在沿着本书各章节探究城市史的时候，在三个方面管理好自己的情感：

第一，把所有历史人物都放入历史情景中去重新认知。在我们的大脑中，现有的历史认知里，有些人是伟人先贤，有些人大奸大恶，他们生来有别，泾渭分明。本书分析历史人物的前提正好相反。本书认为，人性是相同的，人是环境的产物，不同历史人物的不同表现是对环境反应的结果。镇江历史上的每一个人物都是我们的先辈。真切地感受先辈们的经历，才是对他们最大的尊敬。在这本书中，我们所熟悉的正面人物和反面人物被放在同一个平台上冷峻的剖析，或许有些读者很不习惯。在这本书中，任何人都找不到他所需要的英雄。也许，对于那些有英雄情结的人来说，会感觉到是一种冒犯。如果你深受意识形态教育

的影响，认为你心目中的某些人不容亵渎，这一部分读者可以把书合上了。情感过于脆弱的人，是没有能力正确感知历史的。套用王小波的话，历史研究不是慈善事业，没有必要迁就那些情感过于脆弱的人群。马克思说：“伟人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你跪着看他。”如果某位读者感觉到，历史上某一个人物非常伟大，不可替代，只能说明你的膝盖还没有离开地面。我希望我的读者能够平视每一个历史人物。

第二，把自己家族中的先辈视为一个普通的历史人物。这本书研究的是镇江近代史，书中所讲述的人物，几乎都是某些人家族中的前辈，几乎都与现在的镇江居民有关。在历史阅读中涉及自己家族中的长辈时，难免会激起我们更强烈的个人情感。我们每个人都会希望自己的家族在历史上展现出非常光彩的一面，这是人之常情，这也说明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向善之心。但是，历史是已经发生过的事情，它不可能改变，除非你准备歪曲它。历史上每一个人的行为，一定程度上是当时社会制度运行的结果。我们无需太多的把自己同家族中先辈的善恶行为挂钩。相反，先辈们的善恶行为是在为当时的社会制度代言。因为，一种社会制度，是更多的鼓励人们的善行，还是更多的激发人们的恶念，只能通过每一个人在这个制度环境下的行为选择才能表现出来。如果我们试图为先辈们某些不光彩的行为隐瞒，就是在为当时社会不合理的制度掩饰。小而言之，是研究历史的不诚实态度；大而言之，是对人类前途不负责任。本书中所有的史实，只服务于研究的目的。笔者既不准去歌颂什么人，也不准备掩盖什么史实，只有一种单纯而执着的想法：还原真实的历史场景，并从中寻找规律性的东西。希望我的读者从家族情感中超脱出来，同情的理解那一个时代的人，不要去为那个时代的人背包袱。如果某位读者不能接受对自己家族的先辈作出客观的评价，或者希望作者以某种特殊的标准对自己的先辈违心地做一个好评，那么笔者建议你把书合上，以免不愉快的阅读感受，因为这本书一定会让你失望的。所幸，我们朋友和同事中，在谈及自己家史的时候，都能够持有很理性、很坦然的态度。镇江旗人的后裔中，有很多人是我的尊长和好朋友，他们一直在努力为我提供可以用于研究的家史线索。

第三，不要回避城市史中苦难和黑暗的一面。阅读历史并不是一件愉快的事情。直到今天，人类文明的积累仍然是十分有限的。越是逆时回溯人类历史，

人类社会的野蛮成分就越多。很多人习惯于在历史中寻找自豪感。一些编纂者投其所好,把历史中苦难的一面都过滤了。事实上,每个时代的人民,都在忍受着自己时代特有的苦难。我的脑海中总是浮现着几个难忘的历史场景。清初,被清军掳掠的浙江少妇卫琴娘,一路南逃到达北固山,在杨公祠下疲惫的死去了。临死前在墙上留下绝哀的诗篇。这件事情发生在镇江近代前夜。每一次来到北固山,总能感觉到某个墙角下,那幽怨的眼神,穿透数百年历史,在求助,或是在控诉。太平天国战争期间,一路奔逃的读书人李兆炘,在大兵的屠刀落下时仍然怀着祖先遗像。这件事情发生在晚清的转型期间。对于这个把祖先的遗像看得比生命还重要的无辜居民,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对他特别尊敬。清朝灭亡后,失去生活来源的旗人家庭无以为生,常常有贫穷旗人相约投江集体自杀。这件事情发生在本书断代之后。这些在历史中出现过、挣扎过的普通人,才是我们最应该关注的对象。我们没有能力穿越时空去帮助他们。但我们可以努力感受他们的苦难,让他们的冤魂得到安慰。如果我们转而美化那些手握屠刀的人群,把那些施暴的人群视为英雄,我们就愧对他们,我们的心中就不可能有正义。世世代代的人民,经历那么多的苦难,只有极少极少的一部分得以作为历史记录流传下来,这些珍贵的记录提醒我们,我们应该从什么立场出发来认知历史。在本书所涉及的时代,从它的前夜到它结束之后,这些悲惨的场景没有中断过。每念及我们祖辈所经历的苦难,就情不自禁地在心中涌起无限怜惜之情。有共同苦难历史的人群更容易团结,更容易相互珍惜。这座城市的一草一木,都有待我们去发现她的价值。而她的价值蕴含在她的历史之中。当我们知道这座城市的人民曾经经历过如此多的苦难的时候,我们(就)会努力的为她歌唱,为她哭泣。然后,再读艾青的诗句:“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我们就会同诗人的内心有强烈的共鸣!可见,带着个人情感去阅读历史,容易让历史变形;而研读历史时获得的情感,能使一个人的情感得到升华。

是为序。

2016年1月

导言

城市变迁与社会转型

(一)

近现代中国社会转型问题,是一个被史学界普遍关注的话题。在日趋活跃的学术气氛中,近代转型的研究成果也层出不穷。总体而言,有两种研究方法可资借鉴。一种是静态的研究方法,即确定一些近代转型的指标,在近代化进程中观察这些指标的变化过程。陈国庆主编《中国近代社会转型研究》一书,把社会转型视为“从一种稳定状态过渡到另一种稳定状态”的过程。该书从三个方面来衡量中国近代社会的变迁过程,即政治结构、经济结构和文化变迁。从鸦片战争开始,到民国建立,经济伦理的资本主义化趋势出现、民主共和政体确立、科举制度废除后逐渐建立起民众共享的教育制度,以此判断社会转型大体完成,但“尚未最后完成”^①。另一种是动态的研究方法,即追随着不同国家近代化发展足迹,在相互比较中认识近代化的本质。美籍学者王国斌著《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是一部颇富启发性的巨著,作者用比较史学的方法,把中国的近代化过程同西方国家的近代化加以对照,寻找双方历史进程中的“异”和“同”,并且“一方面用欧洲的经验评价中国发生的事,另一方面用中国的经验来评价欧洲”^②。这种动态的研究方法,既可以使读者认识到不同文明发展的独特性,也可以更加清晰地看到双方之间的互动关系。该书分别从经济变化、国家

① 陈国庆主编:《中国近代社会转型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3页。

② [美]王国斌:《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李伯重,连玲玲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中文版序》第2页。

形成、社会抗争三个角度进行比较研究,大大丰富了历史观察的层面。这两种研究方法,对于本书的社会转型研究极具指导意义。

事实上,几乎所有的中国近代史研究者,都把中国近代历史看作是一个过渡阶段。史学研究者,在历史叙事的同时,都在自觉和不自觉地解释这个转型过程。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史学研究的日趋繁荣,研究者们对于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话题也更为关注。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是一部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逻辑严密且旁征博引的经典著作。作者把辛亥革命前的中国近代史视为一个逐步半殖民地化的过程。外国的侵略导致中国的经济形态转变,进而导致剥削关系变化。具体来说,个体小农业和家庭小手工业相结合的经济形态是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资本主义工业品的输入瓦解了自然经济,摧毁了家庭小手工业,中国被迫卷入资本主义商品市场,并在此刺激下产生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革命斗争的性质也从反封建的斗争,发展为反侵略(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伴随着经济形态的转变,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先后诞生,推动中国社会不断进步。尤其是甲午战争之后,清政府放开民间设厂的限制,中国的资本主义获得初步发展,成为政治进步的动力。资产阶级作为革命斗争的领导阶级,因先天不足而表现出软弱的一面,是辛亥革命不彻底、成果有限的原因。美籍华人学者唐德刚的《晚清七十年》,是一部运用西方史学理论范式和概念体系叙述中国近代史的又一力作。唐德刚认为,中国历史经历过两次大转型:一次是春秋末期直到秦汉时期从封建制转向帝制的转型,历时约三百年;另一次是鸦片战争以来帝制阶段向民治阶段的转型,已历时近二百年。因之,唐德刚把鸦片战争以来的整个中国历史,视为一个漫长的转型周期。唐氏认为,近现代社会转型是一个长时段的大事件,需要耗时至少二百年的时间。而晚清的70年时间,即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的历史时段,是这个转型周期的初期阶段。唐氏认为,鸦片战争是大转型的启动按钮,以此为分水岭,出现了“战前千年不变,战后十年一变”的历史异象。正是这“战后十年一变”的急剧变化的过程,隐藏着社会转型的原理。由于一个国家的社会政治大转型是一个规模宏大的系统性工程,涉及物质的、观念的、国家制度的、文化传统的各个方面,是一个“一转百转”的过程,因而在不同的阶段,转型呈现出不同的历史主题。在唐氏看来,在不久的将来,中西制度走向一致的时候,就是这个转型周期结束的时候。相对于这两部全景式的史著而言,国内的许

多学者从某个局部领域来考察近代社会转型。马敏著《官商之间：社会剧变中的近代绅商》，叙述绅商阶层在近代转型中的角色和作用之变化；《商人精神的嬗变——辛亥革命前后中国商人观念研究》则把中国社会从鸦片战争直到辛亥革命之后商业观念的变化作为研究对象。熊志勇的《从边缘走向中心——晚清社会变迁中的军人集团》叙述军事集团中人物在近代转型中的角色转换。所有这些著作，都明确地把中国近代历史作为一种转型过程来加以研究。

社会转型的过程，同时也是意识形态变化的过程。白文刚著《应变与困境——清末新政时期的意识形态控制》一书，再现了清末官方意识形态和民间意识形态此消彼长的过程。清末，随着朝廷权威的衰落，统治者的意识形态系统也受到越来越严重的挑战。旧意识形态体系逐步失去整合社会的功能，朝廷被迫对意识形态体系加以调整，以适应社会转型的需要。该书不仅梳理了清末政府对意识形态调整的历程，而且从三个层面（控制工具、控制制度、控制政策）考察了清政府为控制民众思想所作出的努力。尽管如此，官方的意识形态控制最终以失败告终。来自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等非官方意识形态内容被社会广泛接受，并形成不可抗拒的社会思潮。

辛亥革命是近代社会转型的标志性事件。对于镇江及其周围辛亥革命的研究中，王佩良著《江苏辛亥革命研究》具有较强的参考价值。该书描述了一个完整的转型路径：清末江苏资产阶级发展壮大，相应的政治力量形成，推动革命发展的努力与效果，江苏各地光复的进程，以及革命后的政治面貌。这本著作所使用的整体研究与个案研究相结合、区域研究与全局研究相结合的方法，也为本书所借鉴。

专注于城市近代社会转型的研究，也逐渐成为一个热门话题。只不过，大多数学者把眼光聚焦在上海这样更具典型意义的大城市。民国以来日益式微的镇江，不太容易引起学者们的研究兴趣。笔者梳理了涉及镇江城市近代史研究的著作：

台湾学者王树槐著《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江苏省（1860—1916）》是区域转型研究的典范性著作。书中分别以政治现代化、经济现代化和社会现代化三个专题展示江苏省近代转型的不同侧面。尽管此书并非针对本城市的研究，却为江苏省区域内近代城市转型研究提供了完整的背景材料。

茅家琦等著《横看成岭侧成峰——长江下游城市近代化的轨迹》是“文革”以后城市转型研究的奠基之作。茅家琦先生把鸦片战争视为长江下游城市近代化的启动力量,着力于探求 1840 年之后中国城市逐步走上近代化道路的动因和过程。该书选取了长江下游的南通、无锡、常州、芜湖、镇江、宁波等六个城市作为研究对象,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政治民主化的发展和人自身的全面发展”三个方面考察其近代化的进程。作者以一个专章介绍了镇江开埠之后的近代化历程:在经济领域内,商业资本的快速积累以及向近代工业转型时存在的严重障碍;多元教育体系齐头并进以及兴办教育所取得的成就;社会团体纷纷成立以及因此造成的地方精英力量之壮大。该书的另一个特色是,努力探求长江下游不同城市近代化过程中不同路径,从而为城市近代化路径差异的比较开创了先河。

张仲礼、熊月之、沈祖炜主编《长江沿江城市与中国近代化》,把长江沿江的城市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该书从沿江城市的经济、社会、教育、科学技术甚至民风习俗等多重角度探寻近代化轨迹。其中,经济领域是全书着力之重点,并把沿江城市引进和移植先进生产力和先进经济制度的过程作为考察近代化的主要路径。镇江的近代化进程也自然就作为沿江城市中的一个部分加以考察。这既有利于读者了解镇江近代化的特点,也有利于读者了解镇江近代化的宏观背景以及同其他沿江城市之间的关系。

张洪祥著《近代中国通商口岸与租界》,以通商口岸开放和租界设立的时间顺序,研究了各地通商口岸和租界的设立过程、重要功能及其在中国近代史上产生的影响。镇江作为通商口岸城市,同时也是租界城市,成为该书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该书的部分章节,涉及镇江开埠和设立租界的过程,并探讨了镇江商贸业前期兴旺和后期衰落的情形和原因。在该书附录部分,还探讨了租界的角色和对当时农村经济的影响。

本地的地方文史专家们对地方史的整理与研究,产生了一些成果:镇江籍著名历史地理学家李长傅在民国前期曾著有《镇江地理》一书。该书最早于 1933 年由东方舆地学社出版。全书分 13 章,分别介绍镇江的地形、气候、生物、住民、资源、工商、交通、城市、四乡等。尤其是同本书内容有关联的关于住民、工商、交通、城市等内容,不仅涉及概况介绍,而且常有变迁情况和原因探究,这对于本书的研究很有帮助。贾子彝著《江苏省会辑要》,成书于 1936 年。尽管该书主要介

绍的是民国前期镇江的情况,但是因作者“尤重沿革,藉明始末”,故而有利于借助此书对镇江的转型过程加以考察。该书设置了总说、党政、建设、教育、公安、实业、交通、市政、港埠、社会、捐税、名胜等共 12 章,是一本比较全面的资料性著述。该书关于镇江民国前期实业与社会事业发展趋势的资料,对于本书的研究尤为重要。20 世纪 80 年代初,由南京师范学院地理系江苏地理研究室编《江苏城市历史地理》一书,其中收录了单树模著述的《镇江的兴起和发展》一文,对镇江城市自古及今的发展脉络做了完整而清晰的梳理。该文根据镇江作为交通商贸城市的特点,将镇江的经济发展史划分为渡口时期(远古至六朝)、漕运时期(隋唐至 1858 年)、长江航运时期(1858 年至 1912 年)、铁路运输时期(1912 年至 1949 年)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1949 年之后)共五个阶段。其中的长江航运阶段的内容,显示出开埠通商对于镇江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外来力量彻底改变了城市发展的走势,并在较短的时间里至于极盛。当代学者王骥等编《镇江史话》,叙述了镇江从远古以来历史沿革和地理形势,并以 19 个专题介绍了镇江自古以来历史、政治和社会诸方面的状况。其中近代时期的 9 个专题,大体上勾勒出镇江近代历史进程。严其林、程建著《京口文化》,以探究镇江文化为专题,既分门别类,又纵贯古今,系统地叙述了镇江文化的源流,是一部有关镇江文化的通史式的著作。其中部分地涉及近代前期镇江文化形态的演变,对于本书的写作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作为城市史研究的基础,前人已经在历史资料整理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郭孝义主编《江苏航运史(近代部分)》,介绍了江苏省近代航运的历史,其中有大量关于镇江航运业发展、船业机构的设立、航运业内生态状况,以及外国航运企业与民族企业之间关系等内容。陈敦平主编《镇江港史》,研究的内容主要有:镇江港口的历史变迁、与港口有关的经济活动、对城市经济的影响,等等。张立主编《镇江交通史》,对镇江古往今来的水陆交通变迁加以叙述,其中有关近代交通的内容丰富了读者对镇江近代社会转型的认识。一些研究生论文,也是本课题的重要参考资料。南京农业大学硕士马林 2008 年的论文《清末镇江地域社会研究——以王仁堪任知府时期为中心》,是一篇研究本区域的论文。该论文的主要贡献在于,对王仁堪任镇江知府期间,在整治水利、整顿公益机构、实施保甲体系诸方面的政绩进行了梳理。这些成果都为镇江近代历史研究提供了大量的可贵

资料。

研究镇江的近代社会转型,势必要把镇江放在一个更大范围内进行考察,同周边城市进行比较,从而探究镇江转型过程中的规律。可参考的周边城市转型研究有,黄苇著《上海开埠初期对外贸易研究》展示了上海开埠最初 20 年外贸情况,使读者了解近代初期长江下游通商口岸城市对外贸易的规模和性质。张仲礼主编《近代上海城市研究》是一种全景式的城市研究著作,该书分经济篇、政治社会篇、文化篇,对近代上海各个领域加以探究。李天纲著《文化上海》则提供了另一种研究范例,对上海近代化过程中文化变迁和内在因果进行了深度探讨。除了上海之外,其他城市的转型过程同样具有参考价值。茅家琦等人著《横看成岭侧成峰——长江下游城市近代化的轨迹》一书,把镇江同常州、南通、无锡、宁波、芜湖等周边其他城市放在同一个研究平台加以比较,使得镇江社会转型过程中的特征显得更加清晰。陈晓鸣著《中心与边缘——九江近代转型的双重变奏(1858—1938)》揭示了近代九江两种角色的转换过程:从江西经济体系的边缘转为进出口贸易中心;从长江流域货物调剂中心转为近代贸易体系的边缘。该书对于镇江研究的参考意义在于,镇江在近代史上存在着一个初期中心化、后期边缘化的历程。

(二)

1912 年,清朝政权轰然倒塌。从上一年的 10 月 10 日爆发武昌起义,到当年的 2 月 12 日清帝下诏退位,仅仅 4 个月的时间,一个庞大的政权被推翻了。一个王朝,在没有任何民间政治力量可以取代它的时候,为什么会在很短的时间内迅速瓦解呢?如同医生有责任陈述病人的病情一样,从事历史研究的人,有责任了解并描述一个政治体的生命周期,尤其是在它生命走向终结的时候。因为它所提供的信息,对于人类理解自己和规划未来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中国历史上出现过一次又一次的政权更替,为这种历史分析提供丰富的资料。然而,辛亥革命时期清朝政权的瓦解显然要复杂得多。因为,它不仅包含着传统意义上的王朝覆灭,还包含着社会制度转型。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社会处于急剧变化之中。一个强大的异质力量植入传统政治体之中,干扰了传统政治体制的运作程序,影响了不同政治力量之间的博弈结果,最终改变了中国社会的演进方向。这一改变经历了长达 70 年的时间,呈现出一个不断加速的历史演进历程。在这个过程中,民众的参与渠道不断扩大,政治诉求的表达机会越来越多,社会结构在不断地改变,意识形态逐渐地从以帝王为本位向以人民为本位转变。亿万民众服从一族一姓的政治架构失去了社会基础。最终,辛亥革命成为推倒了旧政治体制的最后一张骨牌,持续两千多年的帝王制度被一举推翻,几乎没有什么政治力量对其抱有留恋的态度,这也足以说明,整个社会已经完成了一个充分酝酿的过程,并不存在意识形态上和社会结构上的重大障碍了。以人民为本位,以民权为基础,以共和为政体的新政治局面基本形成。

笔者希望选择一个点,比较具体、比较精确地考察这一过程。在这一个点上,观察社会结构是如何逐步变化的,社会多元化是如何逐步形成的,传统意识形态是如何被现代思潮所取代的,最终如何完成政治近代化的。

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在这一次政治近代化历程中,镇江是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城市。镇江地处当时中国最富庶的长江三角洲地区,是长江与运河的交汇处,从长江和运河繁忙的商业贸易中受益,经济发达,文化繁荣,容易接受新事物和新观念,深受西风东渐的影响,可以作为当时政治气候的晴雨表。鸦片战争中,镇江经历了最为惨烈的一场战役。太平天国时期,又承受了传统战乱的悲剧性的伤害。租界的设置使得镇江在官府之外新出现了一个制衡性的权力中心,强烈地影响着权力运作模式。自此,社会逐渐多元化,民间思潮有了发展传播的空间,近代民权思想逐步深入人心,形成一边倒的反对满族权贵统治的力量,最后以暴力威胁为后盾,用和平的方式完成了一次十分温和的政治革命。这一过程可以说是辛亥革命时期全中国的一个缩影,革命形式也是典型的温和方式,即周锡瑞所说的“很不革命的革命”^①。后来在紫禁城里发生的一幕,可以说是镇江模式的升级版。所以,把镇江作为一个典型城市,连同她周围的区域,用来分析晚清时期中国社会的转型,是非常合适的。

^① 周锡瑞:《改良与革命》,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 年版,第 8 页。

镇江也是清朝末年社会要素十分齐全的区域，权力架构和经济结构都同整个中国大体相当。有一个地方政府代表行政力量，有一个旗营代表王朝初期征服民族的殖民集团，有一个租界代表强行闯入的西方势力，有一支新式军队代表心怀不满的合法武装，有深厚的农业传统，有洋溢着近代元素的新式工商业，有日趋贫困的城市劳动大军，镇江几乎是当时中国的一个缩微版。她是由内生力量自发完成了辛亥革命的完整过程，作为一个单独的区域与近代中国社会同步转型。研究她的转型过程也就能够发现整个中国社会的转型原理。

然而，这也存在着一个重大的不足。镇江作为一个区域性城市，辖区的范围有限，地方史资料的积累也是有限的。跟本书研究内容有关的地方史资料比较零碎，有些方面甚至是空白。如果试图以这样的地方资料积累，对本区域的近代前期作一个全景式的历史考察，显然是困难的。所以，在文中为了说明某一时期的历史问题，或为了描述某一个时期的历史情境，笔者不得不使用周边城市的资料，或者相同性质的其他城市的资料，向读者提供一个历史参照。笔者相信，这种处理方式不影响读者对本区域转型过程的正确理解。

（三）

对于中国现代化转型原因的解释，已经存在着多种理论。内藤湖南的理论代表了 20 世纪初国外学者对中国历史的理解，认为中国历史代表了整个东亚的历史，沿着自身特有的逻辑发展。中国文化像涟漪一样从中心向周边扩散，周边民族觉醒壮大之后又反作用于中心，并使中国文化因此活力再生而得以复兴。近代中国正处于新一轮文化衰老期，将会因日本、欧美等国文化的反作用而以日本为中心再次复兴。他的最后结论，带有日本中心论的主观色彩，偏离了中国历史观察的应有角度。美国学界对中国近代转型的理解，长期以来一直是把中国近现代史视为深受外力影响而被动改变的过程。这种被指责为西方中心论的理解模式，存在着三种思想框架：“冲击——回应”框架、近代化框架和帝国主义框架。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等学者创立的“冲击——回应”框架类似于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的文化类型学理论，并成为国外汉学界长期以来

主流的研究范式。该理论认为,由于中国传统社会存在着巨大的惰性,呈现出非常稳定的结构,无法通过自身发展实现现代化。近代西方势力在中国的出现对中国是一个刺激。这种刺激促使中国向近代转型。这一理论有效地解释了中国社会转型的启动力量,但却忽视了中国社会的主体作用,也无法揭示中国社会内部制度演进的原理。这是典型的以西方视角理解中国历史的理论。同样,近代化框架和帝国主义框架是西方中心论的另两种版本。以近代化框架理解中国近代历史的学者中,列文森(Joseph R. Levenson)十分执着于把西方的近代化指标作为衡量中国文明程度的范本,芮玛丽(Mary Clalangh Wright)强调西方力量的巨大影响和儒家思想的阻碍作用;以帝国主义框架理解中国近代历史的学者中,詹姆斯·佩克(James Peck)深信帝国主义侵略是近代以来风起云涌的革命之源。两者持完全不同的立场和情绪,却源自同一种思维方法,即中国近代历史剧目是围绕着西方的指挥棒展开的。由于这三种理论模式过于强调外在刺激的作用,其解释力越来越受到质疑。一些学者开始着力寻找中国社会内部演进的机理。柯文(Paul A. Cohen)提出的“中国中心观”应运而生。他在《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一书中,提出研究中国历史应该以中国为中心,从中国内部的实际情况出发而不是以西方的历史为准绳,力图破除中国历史研究中的各种西方中心论。按照柯文的思路,今天的中国只不过是传统中国的延续,西方力量的出现主要在最外层带的沿海地区留下些许烙印,并没有影响中国在解决自身内部困扰的过程中同西方国家并行至今。中国社会从上到下,并不是如人们过去想象的那样聚焦于对西方冲击的回应,而是把几乎全部精力专注于身边的、传统的与自身利益攸关的课题之中。周锡瑞(Joseph Esherick)也倡导,探索一个国家的重大事件,要从这个国家的内部去寻找。周氏认为,传统中国社会中,帝王、地方上流阶层和民众是一个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的关系。鸦片战争后,尤其是太平天国运动之后,清政府为应对新的社会难题的改良措施,壮大了地方上流阶层的力量,从而打破了这一传统的力量平衡。中央政府日益丧失对地方上流阶层的控制能力,地方上流阶层主导并受益的改良活动成本都转嫁给了下层民众。民众反对新政的暴动反过来强化了地方上流阶层控制社会秩序的能力。清朝政府被推翻是其丧失对地方控制能力自然而然、顺理成章的结果,并且成为整个民国时期中央政府缺少权威的源头。由于缺少中

央政府的制约，地方上流阶层日益脱离群众，并为一场更大规模的革命提供了条件。^① 滨下武志则发现，欧洲模式的近代与亚洲自身的近代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就中国近代的经济史而言，中国一直是将外来的影响纳入到自身体系和逻辑中，并沿着固有的路径发展的。滨下武志使用了“朝贡体系”的概念，使人们对隐藏在转型表象背后的中国固有路径理解得更为清晰。以中国为中心的这些理论，强调中国社会自身的演进逻辑，但是无法解释一个问题：即，如果外来力量没有影响到中国历史的固有进程，何以辛亥革命如此不同？传统中国历史上王朝更替时地狱般场景为何不再上演？

以上的理论模型，都能在某种程度上解释中国近代以来的发展脉络，但却没有触及社会转型的最基本的原理。如果把辛亥革命比作一场地震，本书力图从历史的隧道中寻找其震源。表面上看起来，辛亥革命完成了终结帝制这光荣的一页。但启动这一历史演进程序的，是鸦片战争。战争本身对于清帝国的实力没有太大的影响，香港的割让也丝毫不影响朝廷在广阔的疆域内行使权力。然而，战争的结局调整了中国社会的走向，并因此同传统社会渐行渐远。鸦片战争前，中国是一个标准的以帝王为本位的传统社会。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的政治肌体中出现了一个统治集团不得不接受的外来力量。外国势力在中国的存在，起初并不显眼，对王朝的生存也不构成致命的威胁，甚至没有表现出对统治疆域的野心。战争之后，文人非常惊异地发现，这些夷蛮“侵犯数郡，不据土地”^②，有些不可理解。西方人更多地谋求商业利益，所以用较多的精力致力于改变清朝的外交政策与经济政策。有时候，外国势力还会成为统治集团的支持者。这跟以前历朝所遇到的挑战者截然不同。然而，在皇帝和大臣们看来，它们非常令人讨厌地存在，赶不走，碰不得，惹不起。它们不经意地存在着，使得传统的统治术失效。帝王无法在臣民面前建立起绝对权威，无法在帝国的土地上对政治挑战者作斩草除根式的灭绝处理，无法向民众封闭信息实施愚民政策；在与外国人通商的便利中，民间财富不断积累，政府搜刮民财的力度受到一定的限制；更可怕的

① 周锡瑞：《改良与革命——辛亥革命在两湖》，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根据序和跋概括整理。

② 杨荣：《出围城记》，载齐思和等编《鸦片战争》第3册，上海，神州国光社，1954年版，第51页。

是,民众的尊严感和权利意识在觉醒,培养顺民的传统意识形态日渐削弱。外国势力的存在,也限制了传统反对力量的恶性发展。传统社会里,民间的挑战者与统治者是产生于同一政治环境中的同质的政治力量,以同样的手段对付异己,以及夺取政权和维持政权。后来出现的太平天国运动和义和团运动之发展历程,在一定程度上是被外国势力所打断的。无论在朝在野,传统的以极端方式处理异己力量的政治集团都不能恶性发展的时候,多元的社会得以孕育,各种社会、政治力量得以积累,温和的博弈规则得以确立,政治理性和现代政治伦理逐渐发育壮大,酝酿成声势浩大的社会风潮,完成了充分的政治动员。当这些为传统政治所不容的近代因素积累到临界点的时候,终于出现了一次质变,实现了一次政治体制上的革命。